

重读經典

新时代重要文献选读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这篇重要文献科学阐释了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系统回答了把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长征铸就起永恒的精神丰碑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共20余万人，途经十余个省份，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红军将士“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这些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

感于历史使命从事历史研究

史学家吕振羽的治学之道

周文玖

照耀中国前行的信念之光

——读习近平总书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 布成良

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激励创造历史伟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在困顿挫折中奋起，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改革开放后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非凡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55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高速铁路、5G网络等建设保持世界领先，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领

域实现重大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才能找到通向胜利的途径。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取得翻天覆地历史性成就的行动指南。在实践创新方面，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长征精神在百年党史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斗转星移，我们早已远离战火纷飞的险境，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仍然还有许多

“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烁着火热的的光芒。”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正是因为有不灭的信念之火，红军将士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困难中看到希望。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容易患上理想信念缺失的“软骨病”。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挺起脊梁，就要“补钙”。要以伟大长征精神夯实理想信念之基，最根本的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1934年11月，3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彰显着党和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我们要秉承为人民求解放、为万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维护人民利益，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首先，党中央、全党必须有一个核心。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逐步从挫折走向胜利。其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最后，锤炼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政治品格。长征途中，无论是在饥饿、寒冷、伤病、苦痛的生存考验之中，还是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革命危亡之际，红军将士对党绝对信赖和忠诚，坚定

不移跟党走。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他们以崇高的理想、忠诚的品质在血与火中走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今天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就是要自觉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才被迫开始长征。刘伯承说：“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党没有在挫折和错误中一蹶不振，而是在历尽磨难中成长、壮大。“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在新的长征路上仍需跋山涉水。让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吕振羽（1900—1980年），湖南省武冈县（今属邵阳县）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他是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师”。吕振羽的史学研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的根本特质，值得后世继承发扬。

胸怀历史责任感

吕振羽在他生前编定的《吕振羽史论选集》中这样写道：“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诚恳地表达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要义。

吕振羽走上历史研究、历史著述之路，源于他深沉的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1921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志向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电机工程专业，但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这一志向很难实现。在校期间，他认识了革命者夏明翰，听李达讲授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学等课程，思想出现重大转变。他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和社会治理等问题，发表《中国外交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文章，提出对外主权、对内重民生，以及建立乡村自治等具有改良倾向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在经过探索、比较后，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踏进历史学领域。

吕振羽撰写的历史著作，无不浸透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历史学具有“鉴往知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指导群团、民族、人类努力的方向，提高人类的创造作用”的功用。他的著作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是为廓清中国古史之迷雾，也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历史上寻找路径。在抗战时期所著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他批判了各种错误的中国社会史观点，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秋泽修二等散布的“侵华有理”论予

以严厉驳斥。他响应周恩来号召，撰写《简明中国通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和奋起抗战之勇气，使青年人认识到今日中国“是通过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数万年的斗争，即民族的群团生存斗争的历史过程而来的。这是祖宗遗留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它”。1947年完成的《中国民族简史》更是预见到抗战胜利结束：“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迫切需要解决；在我们的主观上也早已提到行动的日程。”这些历史著述，无不体现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把这种责任感概括为“历史使命”，反映出他坚持经世致用史学追求的高度自觉。

既开拓创新又求实求精

开拓创新是吕振羽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放眼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吕振羽的学术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根据就是他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在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

社会研究》中，吕振羽运用神话传说、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研究了殷以前的社会，突破了现代实证史学的藩篱，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他最早提出殷代奴隶社会说，纠正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关于殷代是处于原始社会的观点。他首创西周封建说，此说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人的赞同和进一步论证，是中国古史分期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最早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划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行考察。他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撰写的中国通史，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这些成果足以说明吕振羽的学术风格——善于开拓、勇于创新。诚如学者评论的，吕振羽的史学始终包含着淋漓的创新元气。晚年，即使身处逆境，他仍然不忘开拓史学新篇章。他曾咏诗明志，曰：“脑力衰颓颜岁华，倔强犹欲看春花。近今史事须继续，往日哦吟待选拔。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卅年假我股

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谖。”

求实、求精是吕振羽治学的又一特点。侯外庐评价吕振羽说：“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吕振羽主张研究学术要有科学的态度，惟真理是从。他说：“治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标新立异，同时也反对保守，不为以往的结论所束缚。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敢于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他对自己经过认真探索而得出的结论并不轻易改变。如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同道学术分歧的回应，包括针对吕振羽的古史分期观点。吕振羽在认真研读后表示：“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不过又应声明，在我还没有得出自我检讨的结论以前，对自己原来的见解，现在还是坚持的。”

虽然坚持择善而固执之，但吕振羽绝不掩盖自己的失误，一旦发现错误，就勇于承认和改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某些历史著述，固然充满朝气和学术创造力，但由于他身处动荡的环境，生活常居无定所，查找资料困难，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讹。如柴德赓教授曾指出《简明中国通史》中的问题。吕振羽一方面说明了客观原因，即当时写作下册时“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报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另一方面虚心心地接受批评意见，尽可能地进行修改。他于1951年、1953年、1955年对《简明中国通史》连续作了三次修订，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向读者、学者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晚年仍希望能弥补这部著作“不够细致全面的地方”。在1961年增订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他根据新的调查资料和地下考古发掘资料，增加了《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使论证更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在肩负繁重行

政工作的情况下，他依然把大量精力用在对自己著作的修改和增订中，充分体现出他对待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一直都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致力于历史教学

1960年，中央高级党校正式聘请吕振羽做兼任教授、历史教研室顾问，他开始在中央高级党校讲授中国历史、指导研究生、传授治学经验，为中央高级党校的历史教学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学期间，吕振羽多次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吕振羽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主张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史与论的统一。他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要处理好约、博、精的关系。“约”是指阅读一些主要的史书，掌握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内容。“博”就是要博览，古今中外的著作，各种原始资料、笔记、札记等都要广泛涉猎。内容由专史、断代史再到通史，并进行分类排队，将它们贯串起来。“精”就是精选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把与此相关的资料都找出来，集中阅读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与各家学说进行比较，真正弄弄懂。他教导研究生，要“博”中有“约”，由“约”到“精”，由“专”到“通”，才能有所收获。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吕振羽特别谦虚，他非常尊重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对于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总是采取探讨商榷的态度，从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主张学术民主，倡导百家争鸣。他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其德业风范为中央高级党校的青年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